

2018年台湾电影:

“幸福”依旧在“路上”

□庞盛尧

似乎很难再用简单几个词来描述2018年的台湾电影了,它们一一脱下了近年来的若干标签,陷入难以定性的局面。对台湾电影来说,这一年仿佛温吞吞,阴云笼罩,又似乎总孕育着阳光与希望。

《谁先爱上他的》席卷了下半年的台湾院线与舆论阵地,又极为应景成为金马奖舞台上台湾电影唯一的种子选手。李安主席上任的第一年,大陆电影全面来袭,不仅台片失意,金马奖的颁奖台也并不太平。又是不甚如意的一年吗?可紧接着12月,一部改编自同名韩片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横空出世,以2亿多新台币的票房创下了台湾电影3年来的最佳成绩。台片市场复兴?可一查数据,全台破千万的作品仅有9部,远远不及去年。

隐隐觉得,从年初的《幸福路上》,再到年末的《幸福定格》,2018年的台湾电影,是一直走在探讨“幸福”的路上。电影之神的暧昧之处在于,纵使把一年台片中所有的人物、情节和镜头组合,也拼不出所谓“幸福”的答案,也拼不出一个实在的“城市”。电影的虚幻与真实已经重新编织了历史与记忆,正如“幸福城市”并不“幸福”,“台湾”也从未被看见。对于台湾电影的命运,触得到的恰恰只有当下踩着的那条“幸福路”。

贺岁档“幸福”不再: 动作片革新档期,票房冠军旁落他人

贺岁档形塑了在地观众的一定审美惯性,正如2019年大陆春节档看似科幻元素当道,但其实冥冥中依旧摆脱不了国人爱看的西游IP,只不过这次要棍的换成了外星人。而对台湾观众来说,因为猪哥亮的逝世,2018年的开年影市成为自2013年《大尾鲈鳗》以来第一个没有猪哥亮的贺岁档,那些带着荤段子和本土笑料的“大”系列喜剧终于和观众说再见了。总会有新的类型与元素革新这个档期,而期间必然伴随着观众审美习惯的变化与阵痛。2018年,《角头2:王者再起》加入战局,实在是大大改变了贺岁档的综艺嬉闹感。

《角头2》承接前作的核心命题“角头”(即地方聚落民众的领袖或头目),可谓是为精准地调取了台湾民间俗生活的养分。另一部贺岁档作品《花甲大人转男孩》则承接“植剧场”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剧情、设定与人员班底,讲述以郑花甲与阿玮克服阻碍圆满结合为主要剧情的南部乡间生活。纵使片中也有无厘头的穿越设定,但核心仍是一派温暖动人的台情台事。可见,2018年度的贺岁片虽有类型上的巨大改变,褪下了以往闹哄哄的气氛,却依旧地方元素满满,稳稳抓住台湾观众的情感共鸣。最终,两部贺岁片的票房成绩双双破亿。

对观众来说,成为贺岁档冠军的《角头2》自然是新鲜的类型,先来者中纵有精品之作如《艋舺》,也实在少得可怜。可本土观众的买账,并不能把《角头2》推进优秀华语黑帮片的殿堂。《角头2》已把黑帮片的“形”做足,姚宏易的摄影带来浸入感极强的质感,街头乱战场面感极佳,然而“形”再足也不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黑帮片的复制,“神”的涣散却是大问题。如果将《角头2》纳入犯罪片的序列,同年度台片中反倒是卸下桎梏,轻装上阵的《引爆点》与《狂徒》显得潇洒利落。两者皆由吴慷仁担纲主演,前者更重悬疑和政治阴谋,后者则更重动作及犯罪戏份。吴慷仁在一年之内,见证了两部台湾电影在动作悬疑类型上的突破。《引爆点》由渔民的自

焚事件作引,牵扯出渔民与石化公司的纷争、官商之间的虚与委蛇,其中设置多处反转,节奏紧凑,逐步引人入胜。《狂徒》的特色则是纯粹的动作戏和速度感,在台湾电影的呈现里实属难得一见,吴慷仁在片中贡献了邪气十足的反派表演。总的来说,《引爆点》与《狂徒》都没有囿于在地元素的标签,连口白也几乎全是普通话,又是台片制作中少有的类型,无疑拥有了更大的气象与格局;可它们票房成绩却不尽人意,全台均仅为五六百万,成为2018年台片影市的一个无解之谜。

贺岁档“幸福”不再,而原属于贺岁档的头筹却被一部一点也不“幸福”的电影夺走,正是林孝谦导演执导、翻拍自同名韩国电影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电影在绝大部分剧情桥段上都复刻原作,讲述张哲凯与宋媛媛从小相依为命,但因自身罹患重病、无法陪媛媛走完余生,于是决定亲手把她推向另一段婚姻。在韩式情节剧本就略显俗套的情况下,林孝谦导演对原作的视听转译、对表演的指导就显得步步谨慎而精确。比如,在原作节奏较快的情况下,林孝谦给了男女主人公相处、相知的更多铺垫,同时后半段揭晓反转的剪辑感染力十足。一部有成功原作作为保证、翻拍忠实而又转译精确、“哭爆全台”营销卖点十足的爱情片,最终拿下年度票房冠军,也不令人意外了。如今,《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也已经在大陆院线上映,其在3月15日的单日票房甚至超过了好莱坞大片《惊奇队长》。在台式文艺爆款连续大陆影市多年的情况下,让我们拭目以待它在大陆的最终成绩。

到误会化解、家族亲情的常规圆满结局中,最终取得近2000万的票房。一部《蓝色项圈》则更重议题感,将中学生学习压力过大的教育问题与恐怖类型结合起来,讲述中学校舍内惊悚事件,只可惜偏执于塑造阴森气氛、制造强行反转,却使得叙事焦点不够集中,整体质感不伦不类、令人出戏,浪费了一个不错的题材,票房成绩也并不理想。《蓝色项圈》提示我们,台湾类型片一贯注重的议题性,使得电影背后的社会效力本不会太弱,却往往陷入议题先行的困境,而类型叙事技巧的不足,反倒削弱了电影本身的力量。在2018年的台湾电影中,讲述“山老鼠”窃取树木的《山的那一边》等作品皆是如此,只有台湾少数民族题材的《只有大海知道》清新自然、不落俗套。

台式恐怖片疲态初显

因为2015年的《尸忆》与《红衣小女孩》,恐怖片忽然成了台湾电影市场的香饽饽,而程伟豪的“红衣小女孩”系列几乎以一己之力促成了观众对台湾恐怖片的信赖。2017年的台片票房冠军,正是堪堪破亿的《红衣小女孩2》。如今,该系列再添一部外传,几成台湾最大的商业IP。

《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是那种凭借前作积累的声音而未映先爆的电影,票房下限绝对不低。电影的思路也充分发挥IP优势,以台湾家喻户晓的乡野传说“人面鱼”为故事主轴发展出外传,将“红衣小女孩”系列引向全新的“魔神仔宇宙”(片尾彩蛋还把前两部的剧情贯穿起来),体现出台湾电影在项目开发上的成熟度。但细究之下,曾拍出过《浊流》的庄绚维导演并不比程伟豪做得好:在这凑成电影宇宙的一集中,恐怖体系紊乱,亲情议题过度煽情,又似乎与恐怖的主体魔神仔关联甚微,逻辑难以自洽,以及特效制作依旧差强人意。最后收获近7300万的成绩,显然不及预期。在IP成熟、模式稳定的情况下,吴慷仁在一年之内,见证了台湾电影在动作悬疑类型上的突破。《引爆点》由渔民的自

2018年依旧是恐怖电影的大年。其中《粽邪》延续“红衣小女孩”系列的路线,从台湾民间传说“送肉粽”中汲取养分来演绎剧情,取得近5000万票房的不俗成绩,可见此类类型依旧是台湾观众最为熟悉和青睐的恐怖片。《切小金家的旅馆》开拓出恐怖喜剧的亚类型,以主人公切小金及两名同学在其家族旅馆中的恐怖经历为“幌子”,在其中编织喜剧化的桥段,而实则回归



《角头2:王者再起》剧照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海报



《幸福路上》海报



《幸福定格》海报

斩获了1290万的票房成绩,并成功拿下金马奖最佳动画片,又成为台湾动画电影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笔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它以年初台片第一枪之姿,打开了一个贯穿2018年台湾文艺片的切口——从古至今,那些台湾电影中的“幸福”的样子。《幸福路上》极为直白地讲述了自解严以来台湾民众的“幸福”之路,辅以上女性成长与社会变化的双线并进。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形式低幼,却无时无刻不对应着世事变迁和政治轨迹,实际上已经是拍给成人、供他们缅怀的政治童话。但是过分的堆砌反而促成了虚妄之感,主人公林淑琪的形象真的已经快被标签塞到爆炸了。

堆叠制造回忆的快感,却无法走向未来。《幸福路上》所无法容纳的别个“幸福”的样子,恰好就出现在了本年度的其他文艺片里。金马55台片中的种子选手、最大赢家《谁先爱上他的》所对准的,正是台湾同性恋群体与同妻的幸福。据说,剪辑挽救了成品,那些动画效果、孩子的旁白以及极为舒服贴切的剪辑转场,都帮助电影大大增加可看性,也成功揽下金马最佳剪辑奖。可细究之下,一场在剧中必将上演的仪式,实则完成了片中冲突双方想象性的和解和虚幻的高潮。《谁先爱上他的》的成功在于,让话题度、剧本、剪辑,甚至是演员的表演都完全融为一体,但也是对观众几场大笑、几场泪水的操控,也会模糊了“幸福”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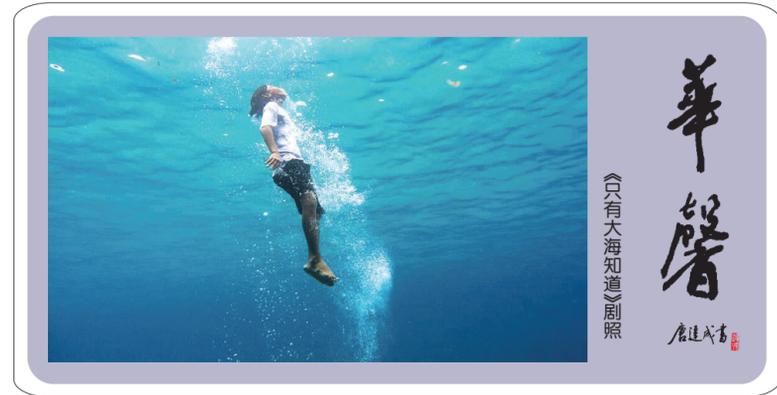
更鲜明地去描绘台湾少数民族的幸福与否的,是《只有大海知道》。在这部电影里,台湾少数民族不再只是某段记忆、某个形象或某个符号,而是真实的兰屿风景、达悟族孩子现实的处境,包括父亲的缺席、生活的穷困、传统文化的留存,以及城市文明与原始文明的冲突……我实在是被小演员钟家俊清新真挚的表演惊艳到,他那素人般的质朴、流动着生命力的双眼和无比自然的演技,竟与他在获奖感言中所透露出的对表演事业的渴望毫不违和,金马最佳新演员确实实至名归。回过头来,《只有大海知道》无所指摘,也无所捍卫,它娓娓道来的姿态,代

表了大众传媒对这座岛屿上的他者的态度真的是在转型。历史是暧昧的,台湾少数民族的生活早已无法用悲情或幸福来一言以蔽之。

其他的文艺片便脱下了议题性与“使命感”,拥有更为舒展的创作空间。在更为自由的表达中,那些共通的价值浮出水面。于是,凭借着对如父如子之间的情感与抉择的最细腻的表达,《范保德》仍然成为了我的年度最佳。两人的两种抉择,父与子之间的深情与无情,都正应了雷光夏创作的主题曲名“深无情”。极少出一次长片的萧雅全,在《范保德》中完成了内容与形式、技艺与美学的高度统一,方寸之间已具大师之象;他以一种留白与隐忍的姿态,完成了对亲情与命运的最微薄却动人的咏叹调。可惜的是,《范保德》在各路陆片的夹击之下,并没有获得金马奖若干重要奖项的提名首肯,颇为遗憾。

同样试图去精致地描绘代际之间的关系与人生变迁的,也是金马奖并不得意的《幸福城市》。它由生命中的三个夜晚的偶然事件,去拼凑成一个男人的必然的命运,其中分别涉及与母亲、妻子与新欢的感情。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恰恰是从偶然到必然的这一步没有落到实处,使得每个段落都容纳了太多的冲突,电影也就流于形式与微微的狗血。《幸福城市》意图从底层的描绘与命运的变迁中去塑造城市的形象,但一种设计感破坏了审美的平衡,这也是它不及《范保德》之处。相似的设计感出现在新人导演黄荣昇的作品《小美》中,其中那种通过数个周边人物来侧面表现一个核心人物命运的形式已经毫不新颖。《小美》在结构的设计上没有落到控诉或解剖人性的实处,无法让观众真正贴近主人公小美的幸福。

在历史如此光鲜的情况下,2018年台湾文艺片中的大师之作并不多,多数纵有心一探台湾人当下之“幸福”,却也常常无力深入,隔靴搔痒。我们欣喜于《谁先爱上他的》《幸福路上》《范保德》一类作品的出现,却也深切希冀领奖台的上下能成为好电影涌现与评判的沟沟。我们盼望那些电影人的野心,实实在在地落到台湾电影脚下的“幸福路”上。



《只有大海知道》剧照

横看成岭侧成峰

——读陈瑞琳《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



陈瑞琳

《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是美国评论家陈瑞琳主编的一部海外华文作家文学选集,该书收入了哈金、严歌苓、张翎、虹影等海外著名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中西文化对峙融合中那些追寻生命价值的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华文文学的独具魅力。

编者陈瑞琳不仅自己创造着细腻优质的华文文学,同时她坚持为海外华文文学做幕后评论工作,从《横看成岭侧成峰——北美新移民文学散论》到《一代飞鸿——北美新移民小说精选与点评》,从《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

读》到《海外星星数不清——陈瑞琳文学评论集》,陈瑞琳始终以开拓者的姿态推动着华文文学的发展,见证着新移民作家的成长。

正如该书总序中所言,白先勇、於梨华、欧阳子等无疑是美文学的重要作家,但陈瑞琳更关注的是她“那一批”北美新移民作家群体,即1980年以后从中国移民的作家。这批作家是与陈瑞琳一同成长起来的作家,已经成为北美华文文学的中流砥柱。陈瑞琳以其前瞻性的目光,敏锐地预见到了华文文学的未来趋势,主编了《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为华文文学研究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作品选中的主人公,有的从中国走出来,走进了域外的世界,用中国人的理解去经历他乡的生活;有的是从西方走进中国,用域外的眼光,去探索东方神秘国度的古老传统。两种文化相遇的路上,必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碰撞与冲突。而海外移民作家直面这些文化冲突,笔下的故事必定是杂糅了酸甜苦辣。

《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中选入了16篇作品,其中多数以女性人物为主角。与大陆作家的书写不同,海外移民作家笔下的女性摆脱了“被救”的命运,转而向“自救”。这些女性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坚强、追求自由、自我救赎。13位妓女最终变成了拯救者,玉莲在丈夫残疾后坚强地挑起生活重担,就连男作家笔下那位丢失了孩子的母亲都要比男性更能承受悲痛,更加具有忍耐力。这些女性身上都有着水一样的柔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她

们都可以用这种柔和的坚强对抗挫折和苦难,不屈从于命运的判决。

海外作家不仅描写情爱,还写出了情爱背后的文化矛盾。他们显然更关注对女性人物的刻画,也许是女性处于弱势地位,使得他们的情感通过女性这一载体得以更恰当地抒发。于是,有了禁禁女渴望“打开”自己、渴望真正爱情的故事,有了为了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而嫁给年过半百的老人的年轻女孩。对于女性移民者来说,爱情抉择有时候与文化抉择、命运抉择相联系。

新移民作家在东西方文化的“离心”状态中艰难成长,自觉地重建独立意义的文化人格。与老一辈的移民作家相比,新移民作家并没有沉溺于苦闷失落的呻吟中,而是更有开拓进取的勇气。他们在怀旧中创新,在怀旧中反省,他们不仅要书写“乡愁”,更要超越“乡愁”,进而对“个体生存方式”进行深入的探求。

大部分新移民作家早年生活在国内,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而后他们又相继出国留学工作生活,在异域生活中感受到中西两种文化冲突带来的不安与焦虑。最早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始终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笔下的故事总是不离故土:例如严歌苓笔下的南京大屠杀、陈谦笔下的十年浩劫、张翎笔下的玉莲等,写的都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故事。但是,她们这种海外角度的“中国书写”又与始终生活在母国的作家不同,有着完全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

张翎说:“我不在那也不在这,我就在中国。”正反映了移民作家进行中国书写时的立场。他们既没有在东方角度里叙述故事,也没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而是站在东西文化中间,隔着巨大的时空洪流,以一种“回望”的姿态去审视母国的历史。因此无论是抗战书写还是“文革”书写,他们的作品都与始终处在传统文化中心位置的大陆作家不同。时代成为移民作家中国书写的底色,而描写人物经历与心理颤动和探究个人命运在巨大的历史悲剧下的改变才是他们“中国书写”的重点。

文学评论和作品解读,是《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的重要部分。陈瑞琳的评论和解读独具特色,正如陈公仲先生所说,“陈瑞琳是一位既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又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批评家,她对于作家作品的品评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美学的尺度”。

作家和评论家的双重身份,让陈瑞琳不只是解读移民作家的作品,更是走近他们的心灵。《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的评论无一例外体现了陈瑞琳对作家个人的理解,如“水做的女儿:张翎”、“‘世界’的女儿:虹影”、“‘书香’沈宁”、“硅谷丽人:陈谦”等。在陈瑞琳的眼中,作家本人的风格和特色与作品的风格和特色息息相关,读不懂作家,就读不懂作品。这种极富个性色彩的评论方式,令作者在读者心中“活”了起来,就像是一个个新移民作家向我们走来。读者在看到小说主人公的人生故事的同时,也看到了作者本人的自

由心灵与丰富的想象力。

陈瑞琳从“生命移植”和“身份认同”出发点评作家作品,有效地反映作品特色以及作家特色。如“对迷迭写作的严歌苓来说,‘移植海外’如同是深根枝蔓忽然嫁接在饱满新奇的土壤,蓦然间开放出再生的奇葩”,“离开了中国的文化背景又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特点,使(严歌苓)获得了一个奇妙的空间”。这些评论,准确概括出严歌苓小说的特点。陈瑞琳认为严歌苓善于描写“边缘人”的生活处境,总是用一个“极端的”故事,在一种“不可能”的环境下展示人性的种种“可能”。又如评价“张翎写春秋,用的是温婉的曲笔……淡笔写来,丝丝震撼,把整个时代的‘风云录’纳在绣枕之上,看去玲珑,囊里却惊涛骇浪,堪为女作家春秋史笔的奇韵”,准确地抓住了张翎的写作风格,描写小人物的跌宕人生,透射人性,反映岁月蹉跎。陈瑞琳准确地指出了虹影的创作特点,“虹影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个人狭小的痛苦和哀伤,而是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寻找的悲歌,甚至是世界性的‘大散流民族’的文化哀歌,更是对人的命运在现代时空下处于‘流浪’状态下的思考”。从虹影的作品,我们很难辨别这是一个女性的写作,她的作品总是将主人公与时代、与国家背景联系起来,因而有着男性书写大视野、大气魄的特点。

感谢《当代海外作家精品选读》这部书,给国内读者带来了绚烂迷人的作家与作品,也标志着海外华文文学走向了经典化的时代。